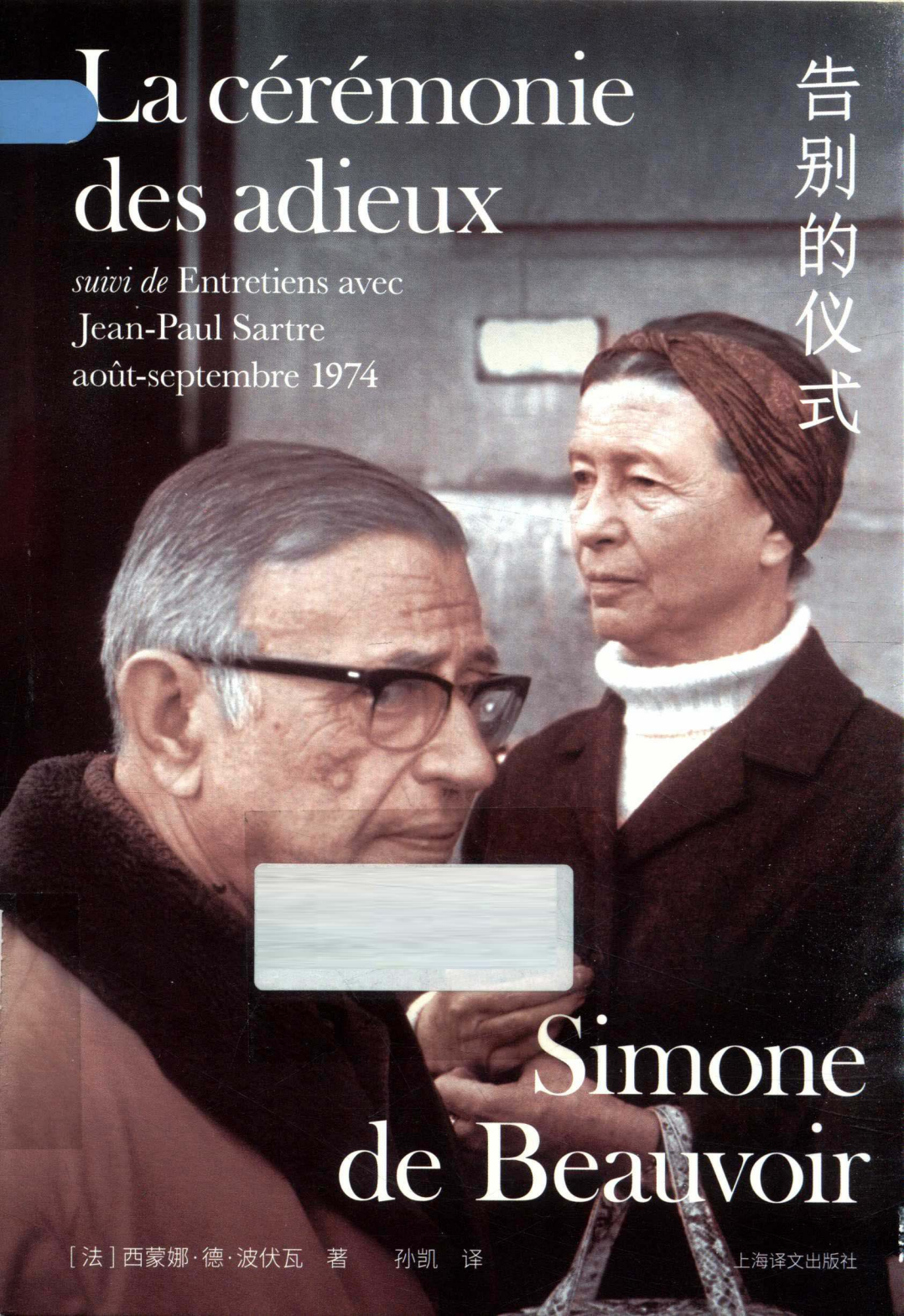


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

suivi de Entretiens avec
Jean-Paul Sartre
août-septembre 1974

告
別
的
儀
式



Simone
de Beauvoir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孙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孙凯 译

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

suivi de Entretiens avec
Jean-Paul Sartre août-septembre 1974

告别的仪式



Simone
de Beauvoir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的仪式/(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

孙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9

ISBN 978-7-5327-7849-2

I. ①告… II. ①西… ②孙… III. ①萨特(Sartre, Jean-Paul 1905-1980)一生平事迹 IV. ①B5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6379号

SIMONE DE BEAUVOIR

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 suivi de Entretiens avec Jean-Paul Sartre août-septembre 1974

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1981年法文版译出

© Gallimard, 1981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图字: 09-2006-482号

告别的仪式

*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 suivi de
Entretiens avec Jean-Paul Sartre
août-septembre 1974*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孙凯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缪伶超

装帧设计 董茹嘉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329,000

2019年9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7849-2/I·4829

定价: 75.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57751097

Simone de Beauvoir

西蒙娜·德·波伏瓦 (1908-1986)

法国二十世纪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1908 年生于巴黎，1929 年获巴黎大学哲学学位，并通过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1945 年与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致力于推介存在主义观点。1949 年出版的《第二性》，在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女性主义经典。1954 年凭小说《名士风流》获龚古尔文学奖。

西蒙娜·德·波伏瓦作品系列

ŒUVRES DE SIMONE DE BEAUVOIR

女宾

L'invitée

人都是要死的

Tous les hommes sont mortels

模糊性的道德

Pour une morale de l'ambiguïté

第二性 I、II

Le deuxième sexe I, II

名士风流 I、II

Les mandarins I, II

要焚毁萨德吗

Faut-il brûler Sade ?

独白

La femme rompue

告别的仪式

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

写给爱过、爱着和将要爱上萨特的人。

前 言

这是我的第一本——也许是唯一一本——您不会在交付印刷前读到的书。整本书都是为您写的，却和您无关。

年轻时，每当我们辩得很凶，赢得漂亮的那个总会说：“您在自己的小盒子里！”^① 您在自己的小盒子里；您再也出不来了，我也不会在哪儿与您会合：就算他们把我埋在您旁边，您的骨灰、我的遗骸，它们之间也无法沟通。

我所谓的您，不过是一种托词，修辞上的小把戏。没人会听到，我也没有对谁说过。事实上，我的受述对象是萨特的朋友，他们希望多了解一点儿萨特的最后几年。这些年，我怎么活过来，就怎么讲出来。我也谈一点儿自己，因为证人就是证词的一部分，不过，我还是尽可能少谈自己。首先是因为，我不是本书主题；而且，正如有朋友问我怎样处理这些素材时我回答的那样：“它们无以言传，不能诉诸文字，不能被思量；只能被经历，如此而已。”

这个回忆录的主要依据是我十年来坚持写的日记，还有我搜集的诸多材料。感谢所有以笔录、口述的形式帮我重新勾勒萨特最后时日的人。

① 法文：“Vous êtes dans votre petite boîte!” 直译为“您在自己的小盒子里”，意指对方囿于己见，一叶障目而不见其他。——译注

目 录

前 言	I
-----------	---

一九七〇年	1
一九七一年	12
一九七二年	25
一九七三年	43
一九七四年	75
一九七五年	90
一九七六年	108
一九七七年	114
一九七八年	127
一九七九年	132
一九八〇年	138

与让-保罗·萨特的谈话	149
-------------------	-----

一九七〇年

萨特的一生，在永无休止的自我拷问中度过；他不否认自己所谓“意识形态上的兴趣”，却不希望被它异化。所以，他常常选择“在思想上推翻自己”，努力“让自己的头脑脱胎换骨”。萨特卷入一九六八年的政治动荡，在这一事件的深刻影响下，他修正了自己的思想。作为知识分子，他觉得自己被质疑，便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开始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并修正从前的观念。

萨特经常解释这件事。一九六八年事件之前^①，萨特把知识分子视为“实用知识的技师”，却被知识的普世性和自己所属的统治阶级的本位主义之间的矛盾所撕裂。因此，知识分子象征的是苦恼意识，正如黑格尔定义的那样；知识分子用苦恼意识本身来满足自己的良知，便自以为可以站到无产阶级一边。现在，萨特认为应该超越这一阶段：和“传统知识分子”相对，萨特提出了“新知识分子”的概念，后者否定自己的文化瞬间，试图找到一种新的“大众化”地位。新知识分子努力让自己融入群众之中，期望让真正的普世性取得胜利。

甚至，在能够清晰勾勒这一行动路线之前，萨特就已经试着去追随它了。一九六八年秋，他开始领导《互斗公报》的编辑工作，

这份报纸在各行动委员会之间流传，时而油印，时而铅印。萨特和热斯马尔见过几次面，对他在一九六九年年初描述的想法深感兴趣：出版一份让群众向群众说话的报纸；或者最好是，让在一定程度上被斗争重塑了的人民向群众说话，把大家争取到斗争的进程中来。这个计划搞了不长时间便终止了。后来，热斯马尔参加“无产阶级左派”，和毛主义者出版了《人民事业报》，这事儿才算干成。这份报纸没有老板，由工人直接或间接写东西，卖得十分红火。报纸的目的是介绍一九七〇年以来法国工人的斗争情况。这份报纸对知识分子往往充满敌意，在谈到罗兰·卡斯特的罗的审判时，也与萨特本人持对立态度^②。

不过，通过热斯马尔，萨特认识了好几位“无产阶级左派”成员。《人民事业报》发表了一些激烈抨击现行政体的文章，勒当泰克（一把手）和勒布里斯（二把手）被捕，热斯马尔和另一些活动分子提名由萨特接任主编。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名字的分量可能会让毛主义者派上用场。后来，他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说：“我厚着脸皮把自己的一世英名放在了天平上。”从那时起，毛主义者改变了对萨特的看法，也修正了对知识分子的策略。

我在《了断一切》中叙述过勒当泰克和勒布里斯审判的情况，五月二十七日庭审，萨特被传作证。那天，政府宣布解散“无产阶级左派”。此前不久，互助大厅里有过一次集会，热斯马尔号召民众五月二十七日上街游行反对审判——他只讲了八分钟，却逃不过

① 尤其是他在日本演讲之前。

② 罗兰·卡斯特的罗是“革命万岁”组织中的战士。五名外来移民工人因瓦斯窒息而死，为了抗议，他同克拉威尔、莱里斯、热内等人一起占领了法国雇主组织的办公室。负责处理骚乱事件的安全部队粗暴地逮捕了他们，随后又将他们释放，却单单不放过在等红灯的时候企图跳出汽车夺路而逃的卡斯特的罗。第二次被抓后，他以袭警罪被判了刑，因为法官拒绝在政治这唯一正当的考量范围内审理案件。萨特作了有利于卡斯特的罗的证词，但《人民事业报》对他的评论充满恶意。

被逮捕的命运。

萨特主编的《人民事业报》第一期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一日出版。当局没有找他麻烦，但内务部长命令在印刷厂扣押所有报纸。幸运的是，印刷工人赶在查封以前把印好的大部分报纸发出去了。政府转而攻击卖报的人，在特别法庭上控告他们重建已被取缔的组织。我还讲了我、萨特和许多朋友在巴黎市中心卖报的事——我们并未受到严重的阻挠。有一天，当局厌倦了这场徒然无功的争夺战，《人民事业报》得以在报亭发售。由米歇尔·莱里斯和我领头，成立了一个“《人民事业报》之友”协会。开始，当局不肯为新成立的协会发放回执，后来我们上诉到行政法庭，才得到认可。

一九七〇年六月，萨特发起成立了“红色援助”组织，他和狄戎是其中的主要骨干，宗旨在于为了反对压迫而战斗。该组织的全国指导委员会在一份由萨特主笔的宣言中声明如下：

“红色援助”组织是一个民主、合法、公开的独立社团，根本目的在于为被镇压的受害者提供政治和法律的保护，并对他们及其亲属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这种保护和支持是毫无保留的……

……人民如果不组织起来，不团结一致，捍卫正义和自由就无从谈起，“红色援助”组织在人民中产生，帮助人民进行斗争。

这个组织包括主要的左翼团体、“基督作证”和其他各色人士。它的政治平台宽泛得很，主要目标是抵抗马赛兰在“无产阶级左派”组织被解散后发起的逮捕浪潮。一大批左翼活动分子入狱，需要搜集这些人的信息，发明新的行动模式。“红色援助”组织有几

千人，在巴黎和外省都设立了基层委员会。里昂委员会是外省同类组织中最活跃的一个。在巴黎，这个组织特别关注移民的问题。尽管这些团体在政治上兼容并蓄，却多多少少被操纵在最为活跃的毛主义者手里。

在满怀热忱地完成左翼工作的同时，萨特仍然用头脑最清醒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那时，关于福楼拜的巨著第三卷正在收尾。一九五四年，罗歇·加罗迪^①对他说：“咱们试着诠释同一个人物吧，我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您用存在主义方法。”萨特选择了福楼拜。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对福楼拜不无微词，但自从读了他的通信集，便完全折服了：福楼拜最迷人的地方在于给想象性以超出一切的地位。到一九五五年，萨特已经写了满满十来本笔记和一千页的稿子，但后来都束之高阁了。这时，他又捡起原来的工作，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〇年间把它们改得面目全非。他将这本书定名为《家庭白痴》，写得畅快淋漓，一气呵成。“它既展现了一种方法，又展现了一个人。”

萨特多次说明写这部书的意图。一九七一年五月萨特与孔塔、里巴尔卡谈话时明确指出，这不是一部科学著作，因为他运用的不是概念，而是观念。所谓观念，是一种将时间因素引入自身的思想，比如说被动性的观念。对福楼拜，萨特采取了一种“移情”的态度。“我的目的就在于此：证明只要方法得当并具备必要的文献，所有人都可以被充分了解。”他还说，“当我指出福楼拜不认识自己，同时又非常了解自己时，我说出了我所谓的‘实际经历’，也

^① Roger Garaudy (1913—2012)：法国政治家、哲学家、作家。20世纪50年代与萨特交往密切，1960年出版《向让-保罗·萨特的提问集》。加罗迪信仰共产主义，曾是法国共产党中的重要人物，后由于政见分歧，于1970年被开除出党，之后皈依天主教，1982年又皈依伊斯兰教。——译注

就是说，生命存在于自我理解之上，无需明确的知识，也无需正题性意识”。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朋友多少有点儿反对他干这件事儿。他们似乎更希望萨特写一些左翼论著，或者为大众写一部鸿篇巨制的小说。但事关创作，萨特不会在任何压力下让步。同志们的观点，他同情却不同意。提到《家庭白痴》时，他说：“从内容上看，我觉得自己在逃避；相反，从方法上看，我感觉自己还是与时俱进的。”

后来，萨特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十七年来，我一直在写一部关于福楼拜的著作，这本书工人不会感兴趣，因为它文风繁复，确实有股资产阶级的味道……我坚持不懈地写，也就是说，我今年六十七岁，五十岁起就开始写这本书，五十岁前我一直惦记着这事儿……在写福楼拜的过程中，我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恐怖孩子，待人认领。”

萨特的想法高深极了：他认为无论在哪个历史时刻，也不管社会、政治背景如何，最根本的事情仍然是理解人类，而研究福楼拜能帮他实现这个目的。

我们在罗马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一九七〇年九月回到巴黎时，萨特对自己介入的各种社会活动十分满意。他住在拉斯帕耶大道的楼房里，在十一层，房间小巧而朴素，对面是蒙巴纳斯公墓，离我的住处也很近。他活得开心，过着很有规律的生活。他经常去看望从前的女友：万姐·克、米歇莱·维安和她的养女阿莱特·艾尔坎姆——他每周有两个晚上在她家度过。其余的夜晚，他和我住，一起聊天儿、听音乐——我弄了个超大的音乐柜，每个月都填充新的内容。萨特对维也纳乐派（特别是贝尔格和韦伯恩）和当代作曲家（施托克豪森、泽纳基斯、贝利奥、彭德雷茨基等许多人）都很感兴趣。不过，他也愿意回过头来欣赏古典大家。他喜欢蒙特

威尔地、杰苏阿尔多，以及莫扎特和威尔第的歌剧（尤其喜欢莫扎特的《女人心》）。我们在房间里听音乐，吃个煮蛋或者一片火腿，喝一点儿苏格兰威士忌。我的寓所被房产中介称为“带凉廊的艺术家工作室”。房间很大，天花板也很高，我在里面度过一日又一日；房里有一部楼梯通到卧室，卧室由一个类似阳台的空间和浴室连起来。萨特在楼上睡，早晨下来和我一起喝茶。丽丽亚娜·西热尔——他的女友之一——会来找他，领他去他住所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儿喝咖啡。晚上，萨特常在我的住所和博斯特^①见面。有时也和一见如故的朗茨曼碰面，尽管二人有时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上意见相左。萨特特别喜欢有西尔薇^②在的周末聚会，星期天，我们三人一起去圆顶酒店吃午饭。我们走得越来越远，看形形色色的朋友。

下午，我在萨特的住处工作。我等待《老年》的出版，构思《回忆录》的最后一卷；他重看和修订了《家庭白痴》中福楼拜博士的肖像。这是一个美好的秋天，蓝湛湛、黄灿灿：今年的兆头很好^③。

九月，萨特参加了“红色援助”组织的一场大型集会，谴责约旦国王侯赛因对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杀。有六千人参加了大会，萨特还碰到了很久不见的让·热内。热内和黑豹党人有联系，在《新观察家》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他们的文章。他打算去约旦，在巴勒斯坦营地待一段时间。

我已经很久不担心萨特的健康状况了：虽然一天两盒博雅尔香

① 博斯特是萨特的学生，曾与波伏瓦建立过情人关系，后来三人一直是好朋友。——译注

② 西尔薇是波伏瓦的养女。——译注

③ 我们保持着用学年计时的习惯。

烟，他的动脉炎并未恶化。然而，九月底，我感到突如其来的恐惧。

一个周六的晚上，我们和西尔薇在多米尼克饭店吃饭，萨特喝了不少伏特加。一回到我的住所，他就开始打盹儿，然后一下睡着了，香烟也掉在地上。我们把他扶上了卧室。第二天早上，他看起来状态很好，回到了自己的住所。然而，两点钟我和西尔薇接他吃午饭时，他每走一步都会碰着家具。我们离开圆顶酒店，尽管没喝多少酒，他却走得摇摇晃晃。我们用出租车把他送到住在龙街的万姐家。下车时，他几乎栽倒。

在这以前，他犯过头晕病：一九六八年在罗马特拉斯特维尔的圣马利亚广场，萨特一下公共汽车身体就摇晃起来，我和西尔薇得扶着他才行。我没觉得这事儿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点儿奇怪，因为他什么都没喝！不过，他的病症过去没这么明显，我开始揣度它的严重性。我在日记中写道：“回来以后，这个小房间是那样令人愉悦，现在却改变了色彩。那么漂亮的天鹅绒地毯，让我想起丧服。生命得继续，运气好的话，还会幸福，还会有快乐时光，只不过，威胁悄悄降临，生命中有了悬念。”

写下这些字时，我十分惊讶：不祥的预感来自何处？我想，尽管表面上故作镇定，实际上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处于警惕状态。第一次警报是高血压的发作：那是一九五四年夏天，萨特刚从苏联旅行回来就进了医院。然后是一九五八年秋天，我领略到什么是焦虑^①。萨特勉强逃过了一场大病侵袭，打那儿以后，威胁一直如影随形：医生对我说，萨特的大小动脉都太狭窄了。每天早晨我去叫醒他时，总先急着确认一下他是否仍在呼吸。不是真担心，确切

^① 参见《时势的力量》。

说，我不过是在疑神疑鬼，但这足以说明一些问题。萨特新添的不适让我不得不悲哀地意识到脆弱的存在——这种脆弱，我并不陌生。

第二天，萨特基本恢复了平衡感，并去看了他的常任医生泽德曼大夫。泽德曼说要作检查，劝萨特在下周日去找专家诊断之前不要劳累。专家勒博教授看后也不能确诊：失衡症可能是内耳或脑子里的毛病引起的。他建议萨特拍一个脑电图，结果却未发现任何异常。

萨特很疲劳：他的嘴里生了个脓肿，还感冒了。不过，十月八日，当他把厚厚的《福楼拜》手稿交给伽利玛出版社时，心情是异常兴奋的。

毛主义者萨特组织了一次去福苏梅尔和其他工业中心的旅行，好让他研究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十月十五日，医生禁止他外出。除了泽德曼，他还看了别的专家，他们为萨特检查眼睛、耳朵、颅骨和脑子，做了至少十一次会诊。医生发现他左半脑的循环系统功能严重失调（这个区域和语言功能有关），兼有血管狭窄。他不得不少抽烟，还要忍受大剂量的注射。两个月之内，他重拍了一次脑电图。也许，到时他就痊愈了。不过，他不能过于劳累，尤其是身体。事实上，《福楼拜》已经结束，萨特也没有什么理由让自己疲劳过度。在这期间，他读手稿和侦探小说，胡乱构思一个剧本，还在十月里帮勒贝罗尔自题为《共同存在》的画展写了个前言——我们非常喜欢他的画，他曾来罗马和我们一起过了两天，给我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认识他的同时，我们也认识了他的妻子，一个活泼搞笑的亚美尼亚少妇。后来的几年，我们常去看他们。他们和弗朗基交情甚笃。弗朗基是一位新闻记者，一九六〇年曾邀请我们访问古巴，后来由于反对卡斯特罗的亲苏政策而遭到流放。